

特稿

## 战略的经典模式

[英] 劳伦斯·弗里德曼

**内容提要：**本文论说了战略学说经典模式中的核心假定决战理念的起源、演进、局限。经典模式将军事要素与政治要素分开，假定政治家决定战争目标，军队将领负责作战事务并免受政治干扰，战场决胜可以确保政治目标的实现。在过去两个世纪的战争实践当中，尤其是在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决战理念的局限性已经在历次战争中体现：一是周密的计划不一定能够成功实施；二是战役胜利无法令敌人彻底失去抵抗能力，无法保证取得胜利，并触发新的问题。因此，战略必须重视军事方面与政治方面的互动，并辅之以灵活性和适应性。

**关键词：**军事战略 决战理论 战略指导

一

“战略”一词源于古希腊语“将军”(strategos)一词，故此，战略指的是将军的技艺。几个世纪以来，战略学说基本主题的发展都借由“战争技艺”之名。直到18世纪，“战略”一词才出现在法国——比“策略”一词含义更丰富，比“狡计”一词含义更平和。<sup>1</sup>到了拿破仑战争期间，“战略”一词得到广泛运用。这是因为，看起来，拿破仑皇帝不仅自身是个天才，他开创的一些系统性基本法则也可以为后世的明智统帅所用。“告诉我，”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年长

劳伦斯·弗里德曼爵士 (Sir Lawrence Freedman) 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荣退教授。

<sup>1</sup> 关于战略的起源，参见 Lawrence Freedman, *Strategy: A History*, New York: OUP, 2013。本文的一些材料直接来源于该书。

多虑的博尔孔斯基公爵问他的儿子安德烈，“日耳曼人是如何用你称之为战略的这门新学问来训练你去打败拿破仑的？”自这个词出现之日起，战略就意味着一种信心，确信只要手段得当，苛刻目标亦能达成。一般情况下，我们所使用的战略一词具有这样的含义。

战略成为一项专门学说并得到发展，原因不外：西方海军和陆军不断职业化，舰队和陆军大规模机动任务日益复杂，战场技术要求——无论是炮术还是围困术——必须得到理解。因此，战略作为一项专门学说，仍然反映了过去两个世纪里战争事务中一些根深蒂固的理念。用以思考战略的这样一个框架可被认为是“战略学说的经典模式”，概因该框架明显来源于战略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甚至，那些很有影响力的当代西方战略理论家——例如爱德华·卢特瓦克<sup>1</sup>和柯林·格雷<sup>2</sup>——也会将自己定位在该经典传统中；此外，其他人——比如约翰·基根<sup>3</sup>或马丁·范·克雷瓦尔德<sup>4</sup>——因为要论述这个经典模式在当今已经不再适用，他们同样会觉得，对这个经典模式进行讨论是有必要的。

这就是战略研究领域的一个突出特征。今天的某位商业战略家，绝对不会在进行新品推广或收购竞争时，还坚持认为19世纪早期文献对他当前的工作具有首要意义。政治战略家可能会觉得那个时期的政府指南古雅精妙，但那也不过是种钩沉史趣罢了。然而，几乎没有任何一位具有职业荣誉感的军事战略家能够绕过克劳塞维茨。还有许多军事战略学家溯源更甚，一直追寻到孙子。<sup>5</sup>就算是更为大胆的现代军事战略家，也很可能会追溯到20世纪中叶的巴塞尔·利德尔·哈特。从事和学习军事战略研究的人，都指望通过阅读经典作品来获取灵感，得到指引，验证史实。

这么做理据充分。军事战略学说是由重大战争所塑造的，而重大的战争乃是罕见之事。在所谓大战中，最堪为渊藪的要数启引无数经典论说的拿破仑战争，其次则要算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距今已经10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早在70年前就已结束。核武器的出现启发了真正具有创新思路的思考，但核武器时代的创新战略思考更多是关于如何威慑制止战争而不是关于如何进行战争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次级领域是在过去的十年里方兴未艾的游击战研究和反叛乱研究。但总的来说，这两项研究还是被视为战略领域的分支。

**军事战略学说是由重大战争所塑造的，而重大的战争乃是罕见之事。**

20世纪70年代，经典军事战略学在美国再次受到热捧，这股浪潮是对官方

1 Edward Luttwak, *Strategy: 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 Cambridge, M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 Colin Gray, *Modern Strategy*, New York: OUP, 1999.

3 John Keegan, *A History of Warfa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4 Martin van Creveld, *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 New York : Free Press, 1991.

5 关于《孙子兵法》的持续影响力，参见该网站：<http://www.sonshi.com/>。

所持那种威慑思维的对抗，也是对美军在越南痛苦经历的反映。尽管经典军事战略学的这次回潮被描述为“军事改革”，但是究其本质要素来说，如前所述，它是一种回归。军事实践的理想类型留存在历史中，留存在理想化的战争模式里：正规部队彼此争夺，将领追逐战利，非战斗人员与战争丝毫无涉；这种模式还假定，国家之命运就决定于战事的结局。改革派们抱怨说，数十年来对于非常规形式的战争全身心关注使得经典的战争模式被忽略。

另一种更加深刻的抱怨是常规部队带兵人的职业生涯深陷于大规模采购计划与五角大楼那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官僚气。五角大楼不需要将道，只需要管理；国防部不需要战略，只需要系统分析。军方不再将战争看作统帅展示其指挥技艺的舞台；而将其视为把弹药火力作为货币、歼敌人数算是产出的账目。

这种批评在军中响应者众，这是因为越战之后，美国武装部队正在寻求重建与改革。因此，人们再次投入战略学说经典模型的怀抱。对经典模式的重新拥抱表现为对机动作战的倚重和对消耗战的尽力避免，体现在战场条令和军事学说发展中，比如说，“空地一体战”。我们可以发现数位过去的大师对这一路径的影响：

- 从约米尼（以及克劳塞维茨）那里，学到战役决胜论；
- 从老毛奇那里，学到“作战实施不应受到政治干涉”的信念；
- 从孙子和利德尔·哈特那里，学会重机动作战、轻消耗战；
- 从克劳塞维茨那里，学会将军事目标描述为一系列重心。

经典模式的回归依赖于冷战语境，同时也依赖于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微弱可能性。华沙条约组织被视为敌方，其大规模陆军和同样可以溯源至19世纪的军事思想的军事学说。苏联重视战役法和机动作战，这一特点强化了西方的战略途径。如果这两支巨型陆军真的打起来的话，双方的作战样式将会非常相似——至少在考虑使用核武器之前。

冷战一结束，大规模战争是不是有可能再次爆发非常值得怀疑，上述概念是否还有意义就相当值得推敲。反叛乱问题重要性再次凸显，同时也变得加倍复杂。核威慑议题仍然存在，同时也变得加倍复杂。此外，在武力使用方面，许多截然不同的新方法出现了，例如为了达到强制对手的目标而使用武力或为了造就既成事实而使用武力等，而这些使用武力的新方法都无法利用现有概念来进行清晰归纳。对新形式冲突——例如，“网络战”——的研究十分活跃。综上所述，人们可能会认为，战略学说的经典模式已经过时。比方说，当我们宣称战争已经发展到“第四代”的时候，未曾明言的个中深意就是：经典模式已经过时了。<sup>1</sup>

本文论点并非倡导大家无视经典模式，也并不认为由于战争的一些转变，经

---

1 Antulio J. Echevarria II, *Fourth-Generation War And Other Myths*,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November 2005.

典模式已经失去其意义。今后可能会爆发的那类战争会受到新的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武器方面的新发展也会改变战争所承载的风险；但是，还不能就此断言历史的延续会被中断。与“第四代”战争有关的活动同样可以溯源至数个世纪之前，同时，大规模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带动军事准备。偶然事件触发大规模战争仍旧不是天方夜谭。两个重要大国——中国与俄罗斯都面临着边界问题。俄罗斯和乌克兰自2014年2月末以来就处于交战状态，尽管目前战事已经有所收敛，但俄乌冲突仍然以一种晦暗两可的复合形式在持续进行。然而无论如何，战略学说经典模式的信徒们并不认为其只适用于大战。经典模式为所有运用武装力量的冲突的指导提供了预期。

本文论点是，从经典论说中发展出来的这套经典模式有一项缺陷，这项理论缺陷与生俱来并且一直造成问题。这项缺陷就是在战略中将军事要素与政治要素的两分。对军事和政治的两分假定，政治要素之于战争爆发时如何设定目标

**这项缺陷就是在战略中将军事要素与政治要素的两分。**

以及战争结束时如何进行和谈是有意义的，但在除去一头一尾的整个冲突过程中，军事要素都必须优先于政治要素。在古代，人们不会对军事和政治进行这种两分，因为人们普遍期待杰出将领能够同时具备军事才能与政治谋略，拿破仑的例子同样大体类此，尽管就拿破仑本人来说，他的军事才能是远远超过其政治谋略的。

后来，政治要素和军事要素被细分开来，这个过程不难理解。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事务和两种截然不同的才干。试图将政治要素与军事要素合二为一，向来是军政关系面临的一大挑战。尽管我们完全可以说，在民主社会中，军事必须服从于政治，但是涉及实际问题时却面临困难：例如，在艰难的政治抉择中，何时应当纳入军方的建议与考虑？在作战问题中，是否可以允许政治家有所涉足？在过去，那些把自己标榜为将军的政治家和那些把自己标榜为政治家的将军们几乎都一个德行，全都干得一塌糊涂。

本文关注重点在于西方传统，因为东方传统——其中特别突出的有中国传统——之源泉是全然不同的。比方说，毛泽东强调，在冲突的所有层面都要重视政治要素与军事要素的互动。在西方传统中，将政治要素与军事要素之间的问题视为自上而下的问题，军政关系问题则只存在于最顶层。克劳塞维茨式公理有云，战争是用其他手段继续的政治。经典模式的问题在于其背后的假定，那就是：一旦政治家将战争目标宣布出来之后军方就该对实际作战过程负上所有责任，还希望在作战过程中政治家的干涉越少越好。其合理性基于这样的假设：实现政治目标的最好方式是在战场上全面战胜敌军。战胜敌国，敌国就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和约条件。军事利得将自然而然地产生政治利得。

因此，这一模式的核心是作为一种能够决出胜负并塑造接下来的政治走势的交战形式的决战概念。瑞士的约米尼男爵（Baron de Jomini）在其那本19世纪影

响最大的教科书里，对此有极为详尽的论述。<sup>1</sup> 尽管克劳塞维茨如今要比约米尼有名，但在当时，约米尼才是影响最大的，特别是对于美国军事思想来说。我们都了解约米尼的积极追随者，执教于西点军校的丹尼斯·马汉（Dennis Mahan）对南北战争时期的将军们的影响。丹尼斯·马汉的儿子阿尔弗雷德·泰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将约米尼的影响运用到了对海权的思考之中。<sup>2</sup> 接下来，阿尔弗雷德·马汉又影响了意大利人杜黑关于制空权的思考。<sup>3</sup>

回顾过去两个世纪里的战争历史——如果我们不单拘泥于重大战争的话——就不难发现：经典路线并未在战争中得到严格遵循，有时甚至被忽略。原因之

**这种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因为战役是战争的决定性要素，所以在战役中取得军事胜利能够带来战争的政治胜利。**

一是，经典路线不仅是一种战争理论，同时还是一种战役理论。这种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因为战役是战争的决定性要素，所以在战役中取得军事胜利能够带来战争的政治胜利。两支军队直接交战时，作战是需要考虑的唯一方面。但是，战争其实意味着更多，除了设置目标与和约谈判外，还包括鼓舞民众士气，保持政府团结，维系战争官僚体系，塑造同盟，寻获基地。本文将主要关注决战观念，考察其演进及局限。决胜战役概念是否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这取决于未来的冲突与战役的关联有多密切，也取决于人们是否会使用不同的方法来使用武装力量。

## 二

西方偏好将战役作为冲突决胜手段，这种偏好多少可以回溯至古典时代。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认可战役为解决争议的一种方法。那时，战役实质上是一种赌博，神意是有可能干涉并改变其结局的。到一天结束的时候仍然能够控制战场的一方有权依据自己的要求来提出政治解决方案。

这种做法的隐含逻辑被拿破仑发挥到极致，同时被论说拿破仑战争的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化约为一种理论。<sup>4</sup> 这种理论对军事手段与政治目标的初始假定就并不复杂。在整个19世纪，这种假定日益简化，其含义成了：取得战役胜利的军队能够完全控制敌国，接下来一定能够取得政治利益。

克劳塞维茨也意识到了发生有限战争的可能性，因为有限战争在那之前一个

1 Antoine Henri de Jomini, *The Art of War*, London : Greenhill Books, 1992.

2 关于马汉，参见 On Mahan see Jon Tetsuro Sumida, *Inventing Grand Strategy and Teaching Command: The Classic Works of Alfred Thayer Mahan Reconsidered*,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with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3 参见 Giulio Douhet, *The Command of The Air*, Translated By Dino Ferrari, New York: Coward-McKann, 1942.

4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世纪是十分常见的，那时，人们也会通过协商和谈而非彻底击败敌军来结束一场战争。克劳塞维茨并没有全面考察有限战争及其所有可能性，但如果他享寿够长，他很可能是会对之进行全面考察的。因此，克劳塞维茨的核心关切仍然在于，如何通过战役来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从而使得敌国没有还击与自卫能力。

这种想法后来成为我们所熟知的“歼灭战略”。德国军史家汉斯·德尔布吕克将“歼灭战略”与“消耗战略”分开，给予这个概念以特别的地位。<sup>1</sup> 德尔布吕克将消耗看作一种劝服敌军在尚未被歼灭的时候放弃战斗的方式。消耗的含义是敌军已然损耗疲劳到不愿再面对战争的地步。如果未出现生死存亡关头，牵涉利益有限，因此存在妥协的可能性，那么消耗战略容易奏效。于是手段上的困难出现了，一系列非决胜战役没有理由不导致消耗局面。

德军总参谋部全然不理睬歼灭之外的任何可行替代方案。在一战到来之前的岁月里，这是欧洲陆军普遍所持的态度。然而，在歼灭战略与消耗战略之间进行选择，并不仅仅是一种战略偏好而已，这种选择还必须能够反映实际情况。如果战役不可避免，那就必须竭力战胜；但是，就算是在决胜战役之后，仍然必需具备足够继续战争、占领敌国土地的剩余力量。如果不能保证最终仍然能够在军事力量方面处于优势地位，贸然争取歼灭敌军就是极不明智的举动。如果要为长期斗争储备力量的话，那么最好避免敌方有备的战役，除非非常有利的条件出现。如果敌军在损失一个集团军之后还能把下一个投入战斗，自己一方的士气就难免受挫。正因为此，人们发展出一种结合了消耗与机动的作战方法，以避免迎头相撞的战役。德尔布吕克希望将这种作战方法发展为对直接战役与机动的混合使用。在德尔布吕克看来，直接战役与迂回谋略可以互替、也可以互补——除非决胜性的战场胜利对于战斗的一方来说已经完全无法企及。

因此，对于决战理念一直存在完全不同的两类批评路线。

一类批评路线提出，要在战场上打败敌军，除了直接攻击之外，是否存在其他手段？另一类批评路线则提出，要获得实质性的政治利得，军事力量是否能够被转化为可观的政治收益？

如果克劳塞维茨当初有机会完成其对歼灭战略支流模式的研究兴趣的话，那么，将有必要对这两类批评路线进行更加仔细的考察。我们可以从克劳塞维茨（那语焉不详的）“重心”概念里看出他这一旨趣。“重心”概念假定，最大的军事效用能够通过打击敌方的力量之源来取得。其一般所指的是军队，但是这种关键打击也可以指对敌方无形力量如“国家意志”或联盟凝聚力的削弱。

---

1 Hans Delbrück,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Political History*, trans. Walter J. Renfro Jr., 4 vols.,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7-198; Gordon Craig, "Delbrück: The Military Historian," in Peter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 三

让我们来考虑一个通常并不被认为是现代军事历史重要一刻的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在普法战争期间。普法战争是一场重要的战争，人们有很多理由这么认为：普法战争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了德国统一；普法战争经验说明，在动员后备力量和发掘后勤潜力时一丝不苟的参谋工作是多么重要。在普法战争中，德国人较其敌手更好地掌握了战役法。然而，当他们在色当会战中全面战胜了法军之后，却因为仍然无法结束战争而感到万分沮丧。德国人指望与之商谈和约的法国政府被推翻，一个新的共和国政府宣布成立，发誓继续战争。这令德国人陷入困惑。他们从来没有想要也没有能力占领法国全境。他们有能力围困巴黎，也确实做到了。然而，一方面，国际舆论日益同情法国，一方面，围攻巴黎的时间越长，士兵们围攻巴黎的代价就越大，其他列强前来援助法国的风险越高。这种情境令想要使用炮兵炮击巴黎来击溃法国人的抵抗的俾斯麦和认为此举将违反战争法的军方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德国皇帝支持了俾斯麦。巴黎遭到炮轰，继而投降。然而，巴黎公社随即又一次将巴黎搅乱，如果法国新政府不将这股“乱象”镇压下去的话，那些苛刻的和约条款就根本无法得到执行。

普鲁士胜利的缔造者陆军元帅赫尔穆特·冯·毛奇，从这个事件及其后的巴黎公社问题中得出了两个教训。第一个教训是，社会与政治力量能够搅乱治国方略的有序推进。老毛奇年岁渐长，亲眼看到社会主义运动在整个欧洲的兴起，他开始相信欧洲的下一场重大战争破坏力将是惊人的，因为这将是人民的战争，释放出的这些力量将摧毁整个欧洲的秩序。老毛奇之后的历任德国总参谋长对老毛奇这种看法的深层含义颇怀芥蒂，因为老毛奇这种预见的个中深意挑战了他们的使命，故而他们竭力轻描淡写之。

然而，老毛奇的继任者们对老毛奇得出的第二个教训却是铭记在心。俾斯麦的看法是，关于如何“确定并限制战争目标”的建议属于贯穿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政治功能”，由此产生文官“对战争指导的影响”。老毛奇的观点是，战略必须“完全独立于政策”。老毛奇指出，指挥官在作战层面上不应受到任何政治干涉。<sup>1</sup>

在老毛奇的继任者那里，“作战不受政治干扰”成为核心信条之一。在1914年的七月危机中，德皇威廉二世只是简单提问：对于接下来所要进行的攻势而言，穿越比利时领土是否明智？当得到答案说此举至关重要之后，他就没有再追问此事。沙皇尼古拉二世同样和俄国将军们就俄国的动员进行过类似的讨论。战争的“作战层面”是不受政治干扰的领域，这一理念从来没有被德国陆军放弃过，

---

1 参见 Lawrence Freedman, *Strategy: A History*, pp.102-107。

也就很快被苏联陆军所接受。特别是，历经越战中事无巨细的政治监管之后，这一理念也成为了美国军方的信条之一。

#### 四

作战层面上的这种顽固信念要求人们确信，决战仍然能够发挥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可能已经挑战了这种信念。随着火力更加猛烈且覆盖范围变得越来越广，而且被动员起来加入战斗的人力增加也前所未有的，赢得战役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在1914年之前，决定性的优势取决于意志和机动或两者得结合来迎战敌军火力并越过敌军防线前面那片“杀伤地带”。士气高涨的将士会勇敢地面对危险；士气低落的部队则会溃败。巧妙的机动能够从薄弱处突袭敌军，并且破除敌军的实际优势；同时，突袭本身还具有心理效应，能够让本来强大的敌方失去判断能力并陷入混乱。从另一方面来说，对于突袭和诡计保持警觉的强大的一方可以期望击溃较弱的一方。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所有这些理论都来接受现实的检验。在一战中，战役规模之大、程度之激烈，以及战事僵局之漫长，都远远超过了克劳塞维茨的设想。然而，尽管一战暴露出诸多问题，决战仍然在职业军人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可能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仍然结束于一次带来停战和德国接受协约国的和平条件的战役。

从此以后，军事战略的目的就变成，如何通过更加有效、更少牺牲的战役来获取决定性的效果。仍然存在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正确的战术——如今还可以加上坦克和飞机的帮助——能够在未来避免持久的僵局。首先，巴塞尔·利德尔·哈特倡导使用间接迂回的机动作战来发挥机械化师的潜能，与西线的直接的阵地攻坚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在整个战争期间投入了巨量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一战中所使用的主要战略让人联想起“消耗”一词，而这个词原本是可以与“耗损”一词相互替换的。关于这种战略的措辞因此更加语焉不详了。其次，利德尔·哈特还认为，如果战争目标能够保持在有限限度内，那么战争手段也是可以保持在有限限度内的，因此，他热心倡导限制战争目标。最后，利德尔·哈特还强调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通过扰乱来战胜敌人，这主要通过突袭来扼制敌人，而不是通过令敌人遭受重大的战场损失来达到。<sup>1</sup>

利德尔·哈特试图设计的避免大规模杀戮而取得传统战争胜利的这种路线，要求重视战争目标，要求将战争目标严格限制在争议事务的范围内，这样，一旦争议事务得到解决，双方就可以重建正常的政治关系，同时，能不打就不打的态度能够减少不必要伤亡和破坏，作战主要依靠突袭和迷惑敌军。

---

1 Sir Basil Liddell Hart, *Strategy: The Indirect Approach*, London: Faber, 1954.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目标无限，战役规模惊人，暴行前所未有，再加上游击作战，并没有能够终结决胜战役概念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再一次地，二战是终结于战败一方的投降。人们对决胜战役概念的坚持在美国对越南的反应中又一次体现出来。尽管越南战争开始于游击战，也不时出现一些战役，但是最终，越南战争仍然以北越部队成功入侵士气衰竭的南越的传统方式结束。这令

**美军对于越战最关键的反应是立即重回自身传统的“精神家园”，即准备在中欧与另一个大国进行一场彻彻底底的常规战争。**

美军产生抵触情绪。一方面，美军声称，如果像打传统战争那样去打越南战争的话，定会打得比这好；另一方面，美军对于越战最关键的反应是立即重回自身传统的“精神家园”，即准备在中欧与另一个大国进行一场彻彻底底的常规战争。

20世纪70年代，美国军队仍在舔舐越南战争带给他们的伤痛，被迫接受一支全志愿役军队产生的影响。此时，有一股十分强烈的信念认为，重塑陆军的最佳手段，就是全力投入保卫北约的中央战线的首要任务。此外，美国的决策者从60年代以来就表明愿望，希望能够减少对于核威慑的依赖，因为他们害怕过度依赖将会使得威胁越来越缺乏可信度。与此同时，在越南战争后期和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已经能够做到对特定目标进行异常精准的打击，新技术引发了对于常规战争的相关学说的重新思考。此外，人们开始担忧，欧洲所面临的安全挑战是否变得更加严重了：华沙条约组织被认为不仅享有数量上的显著优势，还在美国人深陷越南泥潭时已经修订其军事学说，并增强力量。

在越南战争之后，也许曾经出现过对于武装力量如何在复杂政治环境中发挥作用问题的考察机会。但是相反，人们重塑越南问题的语言仍然是常规战争的经典词汇，加之军事方面的新技术发展和苏联的军事力量的扩充，对军事战略问题出现了强烈的非政治化色彩，军事战略被视为机动与消耗两种学说中进行选择的作战偏好。在这种两分法思维发展的人物之中，最有影响力的要数担任过战斗机飞行员的约翰·博依德（John Boyd）。博依德追随利德尔·哈特路向，假定在敌军思维里造成不确定和混乱是战略的关键任务。这可以采取欺骗或者攻击敌方通信手段，削弱其战斗意愿，纵容鼓励其对现实的错误认知来实现。博依德的最佳例证是1940年的法国战役，他将那次战役中的两分描述为“闪电战思路对马其诺防线思路”。消耗战以敌军有生力量为重点，将火力作为有形摧毁力量，而机动作战（闪电战）却将有形力量用来对抗敌方心理，也就是说，机动作战的目标是使用灵活、机动和欺骗来在敌军之中形成“意外和震撼”。<sup>1</sup>

这种错误的两分对立对美国战略论辩产生重要影响，鼓吹用“机动作战”取代“消耗战”。这种发展全然发生在冷战背景下，敌军身份明晰，实力强大，问

<sup>1</sup> 对博依德的最佳导读可以参见Frans P. B. Osinga, *Science, Strategy and War: The Strategic Theory of John Boyd*, London: Routledge, 2007。

题只在于如何威慑制止敌方发动战争，如何在必要时在两个德国的边界上抵御其进攻。因此，问题实质是在欧洲中心地带使用大规模陆军来进行经典的大国对抗。根据信息时代对军事战略的经典文本进行的更新，这种对抗出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对“作战层面”的关注也受到鼓励，而这正是将道得以施展的层面。有一阵子，人们断言作战层面被忽视了，同时被忽视的还有欧洲战争的经典传统。爱德华·卢特瓦克呼吁人们关注作战层面，悲叹当时的美国军事思想无视作战层面。在“作战层面”上，“诸如闪电战或纵深防御等理论才能得以发展和使用”。因为依赖“消耗战模式”，美国人忽略了作战层面。消耗战不被视为应对困境挑战的不得已之举，却被视为某种思维定势的有意抉择。<sup>1</sup>

在军事历史中，对于消耗战和机动作战“二选一”的经验例证非常有限。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都先是试图通过机动作战取巧致胜，继而不得不同敌人打起了消耗战役。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北约中央战线实施机动作战的可能性也被高估。鼓吹迅速且突然之机动的语言颇为吸引，但同样含糊不明：在实践中要如何让规模巨大、行动迟缓的现代军队实现迅速突袭，难以设想。这反映了战略思考中一种本质上浪漫怀旧的观点：试图游离于政治和经济因素的普遍约束之外，一方面对于苏联军事学说和机动作战的胜算的过度强调，对西方成功实施这种作战的能力的过度乐观。当时收到推崇的机动战略很难实现。这些迂回战略在欧洲条件下不啻为高风险选择：不仅需要应对城镇扩张、复杂的公路和铁路网，而且对于情报工作和指挥与控制的效率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不成功的机动作战能够导致绝对的灾祸，令后方暴露无遗。

## 五

对机动作战的重视反应了对通过决胜一击取得胜利的渴望，由此产生三个问题。

第一，无论强有力的一击的计划制定得有多周全，实战中都是有可能会失败的。我们在此处面临的问题正如老毛奇的名言，“一旦战斗打响，任何计划都很难经受考验”。那些理念上精彩大胆的行动计划，执行起来可能根本就行不通。

第二，就算强有力的一击得以实现，必须立即达到使敌人在战场地上一蹶不振的效果，而不能让其苟延残喘。如果敌军有相当部分的力量得以逃脱并参加后续战斗，又或者如果敌军预先保存了一部分战斗力量作为预备队，那么战斗就还得继续。如果不能及早迫使敌军投降，那么一击得胜的战斗仍然可能演变为漫长的僵局。就算敌军常规兵力业经击败，仍然有可能面临如同拿破仑军队面对的西班牙

---

1 Edward N. Luttwak, "The Operational Level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5, No. 3, 1980-1981, pp. 61-79.

牙游击队的非常规抵抗，以及心怀抵抗、拒绝合作的民众。要确保一击战胜之后能够订立和约，也许需要占领战败国家，但是占领一个战败国之费时费力不啻于一开始那致胜一击。从另一方面来说，回避占领则可能令政治和约难以执行。

第三，取得胜利的真正关键可能并不是军事谋略的质量，甚至可能不是战斗表现，取得胜利的真正关键往往在于一些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战略任务，包括如何在困难日渐增多、需要做出的牺牲也日渐增多的情况下维持民众士气，如何同具有共同安全利益的国家塑造和维持联盟以重塑同盟、维持制衡，如何分化瓦解敌方的同盟。

因此，战斗可能无法决胜，敌军忍耐与坚持的能力可能超乎预计，同盟制衡也许与军事力量制衡同样重要，冲突结束的方式亦可能混乱而无法令人满意。平定对手直至其无法抵消己方意志的任务异常艰难，也极少真正得以完成。同时，

**如果下定决心  
一定要打败敌军，那么，微不足道的争端也可能导致相当规模的作战。**

就算限制政治目标，军事方面仍然面临艰巨的任务，而且难以避免犯错。战胜敌军所需的力量有赖于敌军的能力与行动，而并不在于涉及利益的大小。如果下定决心一定要打败敌军，那么，微不足道的争端也可能导致相当规模的作战。

西方特别是美国武装力量，战役表现相当优异。这一点两次体现在伊拉克战场上，同样也体现于阿富汗战场。1991年，赢得战斗确乎导向了胜方所需的政治结果，即解放科威特，但这场战争让一场冲突悬而未决，并且最终演变为另一场战争。在第二场战争中，美军同样取得了明确的战场胜利，但是接下来的社会与政治动荡持续已经超过十年；而且最近一个时期，形势还在进一步恶化。

## 六

今天，我们处于与经典战略复兴的冷战两极世界极为不同的环境之中。在那时，政治背景不仅一目了然，而且预期的变化非常有限。目前我们所面对的国际情势不断变化，极不确定，有些国家在崛起，有些国家在衰落，不同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相互竞争，相互依存情况复杂，媒体报道铺天盖地，社会网络联系日益密切。一些国家和一些派别一时被妖魔化，一时又翻身成为潜在伙伴。

所有这些都使得制定长期目标变得日益艰难——区别于最为普遍的那种目标。战略的经典模式在过去一直问题重重，而在现在这个必须将战略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结合起来思考的时代里，其自身存在的问题就更大。如果不能结合战略中的政治要素和军事要素，就一直会存在这样的不佳倾向：在军事话语中，许诺以明确手段解决问题，然而这些问题根本无法使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在政治话语中，设定符合核心价值和核心原则的远大抱负，然而这些抱负却远远超乎现有资源和已知手段，不切实际。

冲突是逐渐升级的，首次行动很少成为决胜一击，故而其后的举动将取决于首次行动如何改变情势，包括那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和各方的反应。正因为如此，许多武装冲突结束的时候并不存在明确的胜者和败方，相反，这些武装冲突无论是艰难持续还是勉强结束，都迫使双方做出了一些令自己不满的让步，而这些不情不愿的让步则蕴含了继续冲突的可能性。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冲突在武力干涉进入后都不会产生泾渭分明的胜负格局。这毋宁是说，存在例外，并非千篇一律。因此，挑战在于，我们从一开始就要仔细思考战略中政治要素与军事要素如何互动；挑战也在于，我们必须意识到因为冲突是逐渐升级的，所以领袖必须要展示出适应性和灵活性来。

（李隽旻 译；李晨 校）